

摘要：在中国古代服饰中，冠帽的地位十分重要，它是社会等级、地位的象征。衣冠制度在契丹被称为“国制”，其中的头衣即冠帽。契丹以金冠为重，纱帽次之。本文以文献及考古资料为据，通过分析契丹金冠的材质和纹饰，划分出契丹金冠的型式，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对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作以探究，以期管中窥豹，对当时的契丹文化给出一定解释。

关键词：契丹；金冠；形制

契丹金冠型式研究

◎卢昉 王江鹏

一、引言

契丹是我国东北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她源于东胡，属鲜卑族的一支，据史书记载，契丹发源于大兴安岭，公元4世纪左右，契丹先民便开始游牧于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一带，契丹人随水草而居，以车帐为家。唐宋时期，契丹发展壮大，创立了绚烂多姿的游牧文化，契丹族建立的辽代，疆域一度达到北宋的两倍。契丹人的生活习惯与汉人迥然不同，然而在文化方面，契丹却一直受中原汉民族的影响。契丹服饰多袭唐宋之制，而契丹金冠，则可看作汉民族与契丹族文化融合的最佳载体。

二、契丹金冠的型式

畜牧是契丹人的传统产业，据《契丹国志》记载，从传说中的先民时代起，契丹人便“戴野猪头，披野猪皮”^[1]，汉魏时期，契丹人开始使用步摇，步摇冠由多片金质冠饰连缀而成，人行走时，冠上的饰物会自然摆动，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辽代建立后，戴冠之风兴起，契丹人不论男女老幼，均喜佩戴。日常生活中的契丹人戴冠之俗，比文献记载的还要复繁复多彩。这些情况，多为考古发现的大量辽墓壁画所证实，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实物资料，契丹金冠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衣冠制度在契丹被称为“国制”，其中的头衣即冠帽。契丹人的冠帽有金冠纱冠、毡冠、幅巾、帕头、瓜皮帽等。契丹以金冠为重，纱帽次之。金冠为契丹贵族阶层所用。《辽史》、《契丹国志》多次记载契丹皇帝、大臣在祭祀礼仪活动时着金冠。据文献记载及考古资料分析，契丹金冠可分：金文金冠、鎏金银冠和鎏金铜冠三类。

第一类：金文金冠

通体金质。迄今为止，因尚未发现实物材料，故其形制纹饰无法详述。依现有文献推断，金文金冠乃契丹冠帽中等级最高之冠式，乃帝王举行祭天地、山



河、祖宗等大祀吉仪时佩戴。《辽史·仪卫志》“国服”曾载，“辽国以祭山为大礼，服饰尤盛”，“大祀，皇帝服金文金冠”。《辽史·礼志》也载：“祭山仪……皇帝服金文金冠”。^[2]由此可见，金文金冠乃皇帝专用。

第二类：鎏金银冠

银质，表面鎏金，乃契丹贵族官吏之生活用品及随葬明器，其材质之奢华，纹饰之巧计，仅次于金文金冠。《辽史，礼志》“贺祥瑞仪”有“北南臣僚金冠盛服”之说，此处的“金冠”，指的就是“鎏金银冠”。^[3]另据《契丹国志》记述，宋朝曾赏赐契丹使者“金涂银冠、皂罗毡冠”，^[4]这里的“金涂银冠”即为“鎏金银冠”。据目前发现的考古资料分析，鎏金银冠可分3式。

1. 双兽戏珠式 2件。

二龙戏珠式 1件。1957年辽宁建平县张家营子勿沁图鲁村辽墓出土，冠高19cm、冠口20.9cm，冠周锤鏤如意纹，主体纹饰为二龙戏珠，两侧二龙相对，昂首翘尾，栩栩如生，中心饰一火焰珠，空隙填饰卷草纹与忍冬纹，珠顶



图1 鎏金银冠正面



图1 鎏金银冠侧面

（图片来自：冯永谦：《辽宁省建平、新民的三座辽墓》，《考古》1960年第2期。）



图2 鎏金双凤银冠正视图

（图片来自新枫毅：《辽宁朝阳前窗户村辽墓》，《文物》1980年第12期。）

饰蕃草纹，整体纹饰错落有致，层次分明，雕工考究。^[5]（图1）

双凤戏珠式 1件。

1972年辽宁朝阳县二十家子公社何家窝铺大队前窗户村辽墓出土。残高20cm、冠径19.4cm、周长62cm。冠面上宽下窄，两侧双凤相对，昂首展翅，长尾蹁跹，正中悬一火焰珠，中有祥云浮动，图案疏密有致，线条流畅，形象生动。^[6]（图2）

2. 高翅式 1件。

1985年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奈曼旗辽陈国公主与驸马萧绍矩合葬墓出土，公主冠。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是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契丹贵族墓。该墓出土的金银器数量众多，精美绝伦，反映出契丹民族高超的制作工艺及技术水平。其中有公主冠、驸马冠各1件，均为鎏金银冠。公主冠冠顶为穹庐形，上有小孔2个，两侧各饰1大立翅，冠冕正面及立翅均镂雕相对的凤鸟，周围衬以云纹。考古人员在清理这座墓葬时，在银冠旁边发现1银质鎏金道教造像，像后有背光，底座饰重瓣六出镂空花叶纹，边缘饰卷云9朵，座底有2小孔，与冠顶2孔完全吻合，估计原先饰于冠顶，因埋藏年代过久被腐蚀脱落。^[7]（图3）

3. 镂雕连缀式 1件。

1985年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驸马冠。该冠以16片镂雕银片连缀制成，银片以银丝为系，边缘呈如意形，冠冕前片饰1道教人物，后片为“山”形，通体共缀21件圆形镂雕凤鸟花卉纹

鎏银牌饰、2件鎏金银凤牌饰和1件宝珠形鎏银牌饰。（图4）

第三类：鎏金铜冠

铜质，表面鎏金。目前能够看到的史籍中，尚未见到使用鎏金铜冠的相关记载，但据文献可知，契丹人皇帝服金文金冠，大使涂金银冠、臣僚金冠盛服。故笔者推定，鎏金铜冠乃身份略低的贵族所用，据考古资料分析，可分3式。

1. 双凤戏珠式 2件。

1989年辽宁建平县北二十家子镇炮火营出土1件。由两片如意云形鎏金铜片复合而成，右侧已残。冠面主体纹饰为双凤戏珠，双凤相向，展翅翱翔，当中饰一火焰珠，以镂空水波纹为地，下饰卷云纹，底部饰莲花，火焰珠与莲花间刻4个梵文，两侧篆刻牡丹串枝纹。



图3 陈国公主墓公主之冠

（图片来自：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陈国公主附马合葬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1期。）



图4 陈国公主墓驸马之冠

（图片来自：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陈国公主附马合葬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1期。）

^[8] (图5) 此外, 在内蒙古库伦旗5号辽墓也出土鎏金铜凤冠1件, 形制与该双凤戏珠鎏金铜冠颇为相似, 应属同一冠式。

2. 高翘式 1件。

1989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温多尔敖瑞山辽晚期夫妻合葬墓出土, 女用冠, 形制与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公主冠极为相似, 冠顶为穹庐形, 冠两侧各有1高立翅, 底边插入冠口边带。冠带宽2.5cm, 上刻卷叶纹, 4条立带和冠叶相连, 固定相接的冠叶, 相交于冠顶, 冠顶饰火焰珠, 顶花及冠上装饰脱落, 冠冕通体饰镂空缠枝牡丹, 形式美观, 做工精致。^[9]

3. 镂雕连缀式 1件。

1989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温多尔敖瑞山辽晚期夫妻合葬墓出土, 男用冠, 与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驸马冠颇为相似, 冠冕由8片鎏金铜片制成, 6片冠叶插于冠口之中。叶片边缘为如意云朵形, 内镂菱形底纹, 其上刻有龙凤、祥云等图案。出土时冠饰脱落, 铜片散乱。考古人员在棺内发现了散落的凤鸟、鱼龙、如意、火焰珠等11件冠饰, 据其材质及纹饰分析, 分属男女两冠。参照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所出的公主冠和驸马冠, 极有可能缀于冠顶。

迄今为止, 除金文金冠未见实物外, 鎏金银冠、鎏金铜冠均有一定发现。据上述资料分析, 契丹金冠可分三式。

第一式: 双兽戏珠式。冠体用银或铜片制成, 其上锤鏤纹饰。辽宁建平张家营子出土的二龙戏珠鎏金银冠, 辽宁朝阳县前窗户村出土的双凤戏珠鎏金银冠、辽宁建平北二十家子镇炮火营出土的双凤戏珠鎏金铜冠、内蒙古库伦旗5号辽墓出土的双凤戏珠鎏金铜冠均属

此式。

第二式: 高翘式。女用冠。冠顶为穹庐形, 双侧饰两个大立翅, 冠顶及冠口均装饰纹饰。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公主冠,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温多尔敖瑞山辽晚期夫妻合葬墓出土的女用冠为此式。

第三式: 镂雕连缀式。男用冠。冠冕由多枚银片或铜片连缀而成, 银片之系为银丝, 铜片以铜丝为系, 冠上缀饰各种饰件。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中的驸马冠及赤峰阿鲁科尔沁旗温多尔敖瑞山辽晚期夫妻合葬墓出土的男用冠为此式。

三、契丹金冠的文化内涵

1、宗教

辽代契丹族的宗教信仰, 除萨满教是其原始宗教外, 同时还流行佛教及道教。《辽史·太祖纪》曾载, 神册三年(918年), “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10], 可见契丹统治者对儒、佛、道三者采取兼收并蓄之态。辽中叶以后, 由于政云多变的社会现实和仕途沉浮的政治命运, 贵族官僚生活颓靡, 精神空虚, 而此时禅宗正大兴其道, 其无视戒律, 不因循旧规, 既无求无人, 又洒脱放旷的精神境界, 对某些官僚贵族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不少人从中发现了全新的自我价值, 探求到了另外的人生, 加之上行下效, 皇室提倡, 致使信徒甚众。“多舍男女为僧尼”^[11]。据《辽史·兴宗纪》载, 圣宗曾多次游幸佛寺, “尤重浮屠法”亲往佛寺受戒, 命皇子梁王召僧讲论佛法; 道宗也“好佛法, 能自讲其书。每年夏季, 辄会诸京的僧徒及其群臣, 执经视讲。所在修盖寺院, 度僧甚众”^[12]; 太后萧燕燕“每岁正月辄不食荤茹, 大修斋会及造寺”^[13]。佛教之风日见其盛。与此同

时, 道教也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辽圣宗对“道释二教, 皆洞其旨”^[14]。其弟齐国王隆裕“自少时慕道, 见道士则喜。后为东京留守, 崇建宫观……又别置道院, 延接道流, 诵经宣醮。”^[15]兴宗“常夜宴, ……命后妃易衣为女道士”, 道士王纲、姚景熙、冯立等皆获宠幸, 并授官爵。”^[16]

统治阶级佛道并重的政策, 反映在冠帽上, 即采用了不少佛教和道教的装饰图案。火焰珠、莲花等纹饰明显是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至于道教人物的出现, 则从侧面反映了道教的传播在当时已达到一定普及。从鎏金银冠看, 建平张家营子的二龙戏珠鎏金银冠和朝阳前窗户村的双凤戏珠鎏金银冠, 均饰佛教文化流行的火焰珠, 应与佛教有关。而陈国公主墓出土的公主冠和驸马冠, 均有道教人物造像, 且以卷云、凤鸟为饰, 明显受到了道教文化的影响。至于鎏金铜冠, 辽宁建平北二十家子镇炮火营出土的双凤戏珠鎏金铜冠, 饰火焰珠、莲花, 并刻有梵文, 应与佛教有关。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温多尔敖瑞山辽晚期墓出土的2件鎏金铜冠和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2件鎏金银冠形制虽极为相似, 但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所出鎏金银冠饰有道教造像, 而温多尔敖瑞山辽晚期墓出土的鎏金铜冠饰火焰珠。笔者推测, 这很可能是两墓主人的身份和宗教信仰不同所致。



图5 双凤戏珠鎏金铜冠饰

(图片来自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建平北二十家子镇辽墓清理简报》,《北方文物》1991年第3期。)

2、民族交融

民族学观点认为，服饰是除了宗教、艺术及文学之外，最值得探究其内涵的文化现象之一。以契丹人为例，他们长期生活在北方，其服饰必然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早期的匈奴、鲜卑等北方民族，就都很喜欢佩戴金冠或在冠上加金饰。内蒙古阿鲁柴登匈奴墓出土的鹰形金冠，冠口由半圆形金带组成，冠顶的鹰形装饰用黄金及绿松石制成，其头、颈、尾均可活动，冠身造型美观，工艺精湛，形象生动地刻



图6 鹰形金冠

画出一只站立于狼羊缠斗的环形冠带之上的展翅雄鹰，是匈奴工艺技术的杰出代表。^[17]（图6）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就是对生产对象征服、占有并驾驭。匈奴是契丹早期的一支，在匈奴人眼中，鹰是力量和自由的象征，再加上冠上装饰的猛虎、角羊、骏马等北方草原常见的动物，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草原风情。至于契丹金冠，如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和赤峰阿鲁科尔沁旗辽晚期夫妻合葬墓出土的金冠，从形制看，与上述匈奴、鲜卑金冠基本相似，应该存在一定的承袭关系。而前文提到的三种契丹金冠形式，亦与中原地区冠式不同，应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冠式。不过，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匈奴金冠上具有浓烈北方草原文化特色的，如动物厮杀、牧人骑猎等风格的图案纹饰，在契丹金冠上，已几乎见不到了。

契丹族所建立的辽最为兴盛的时期，正好处于我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之际，当时辽宋交往频繁，边境设榷场，开茶马互市，辽人服饰在演变过程中，或传承前代之制，或融合周边民族之风，宋辽服饰的融合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而契丹金冠，也在发展中逐步汉化，使用不少汉文化装饰。上面提到的辽宁建平县北二十家子镇炮火营出土的双凤戏珠鎏金铜冠，其上的龙凤、祥云、缠枝牡丹等图案，就是汉文化对其影响的绝佳印证。

注释：

- [1]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M]“契丹国初兴本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
- [2][3] 脱脱.辽史·礼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7月。
- [4] 同[1]。
- [5] 冯永谦.辽宁省建平、新民的三座辽墓[J].考古.1960(2)。
- [6] 靳枫毅.辽宁朝阳前窗户村辽墓[J].文物.1980(12)。
- [7]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陈国公主附马合葬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7(11)。
- [8]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建平县两处辽墓清理简报[J].北方文物.1991(3)。
- [9] 赤峰市博物馆考古队、阿鲁科尔沁旗文管所.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温多尔瑞山辽墓清理简报[J].文物.1993(3)。
- [10] 脱脱.辽史·太祖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7月。
- [11] [宋]苏辙 栞城集[M]卷四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0月。
- [12] 脱脱.辽史·兴宗纪[M].契丹国志·兴宗纪。
- [13]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蕃夷[M].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 [14] 脱脱.辽史·圣宗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7月。
- [15]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齐国王隆裕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
- [16]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兴宗纪[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
- [17] 田广金、郭素新.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J].考古.1980(4)。